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百家争鸣】	倒罗瑞卿事件的一则解读	黄力民
【文革忆往】	9·13的记忆	王林光
【文革反思】	文革浪漫主义为何失败？	萧功秦
【文革一页】	对文革初期郭沫若“焚书声明”的回顾	章继光
【往事如烟】	秘书眼中的罗瑞卿	王仲方
【书刊评论】	《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推荐语	启之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一）	钱理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百家争鸣】

倒罗瑞卿事件的一则解读

· 黄力民 ·

对罗瑞卿的批判始于1965年12月8—15日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次年5月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会议同时发布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就此揭幕。研究者多认为倒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的前奏，但倒罗事件的真实原由与过程至今仍难以完全揭开，本文从一个方面对此解读。

—

五十年前，1966年3月4日揭批罗瑞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持续到4月8日（中间3月18日发生罗瑞卿跳楼），正式发言材料达80多份。4月30日主持会议的中央工作小组递交《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批准转发：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中央工作小组即毛泽东指定的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后离京去外地，彭真的作用很可笑——中央批语提到的六个附件之一叶萧杨刘致中央信就是关于“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因此批罗会议实际由叶剑英主持，连同中央批语提到的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这是北京批罗会议的中坚。

此前上海的批罗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也是主要发言者。

林彪、叶群都没有出席北京批罗会议。上海批罗会议时林彪没有出席小组会议，叶群在会上有长篇发言，会议前叶群曾携林彪信件从苏州赴杭州面见毛泽东。林彪11月30日信写道：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林彪称“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十分用心地表明自己的被动卷入批罗。“重要的负责同志”都有谁？说了什么？可能永远都难以准确知晓，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能有此举动，或者出自他人的授意，或者听到某种风声。可见叶群赴杭州面见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发言不过是毛泽东倒罗的众多棋子之一，并无充足理由可以将其视为倒罗瑞卿的主要因素。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叶群到杭州面见毛泽东时杨成武、张耀祠都知晓其来意并有相互交流。

二

从上海批罗会议到文革初期，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的情况是：

萧华1959年军委成立不久就任副秘书长，1964年任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曾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

杨成武1965年6月任军委副秘书长，上海会议后罗瑞卿的军队职务停止，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7年始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9月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刘志坚1957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继傅钟、萧华、甘泗淇之后的老资格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

叶剑英1966年1月与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同时增补为军委副主席，5月23日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曾有的两个职务），8月任政治局委员。

谢富治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66年8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

上海批罗会议后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标示文革揭幕，但林彪仍然是养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的另一着棋才将他推上文革前台。

三

1967年初刘志坚倒台，1968年初萧华、杨成武先后倒台。

1973年底罗瑞卿解除监禁，1974年9月始刘志坚、杨成武、萧华先后解除关押审查。

1974年11月杨成武出任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此时总参谋长职位已空缺3年多，1975年1月邓小平任总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后成立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军委办事组，1975年2月5日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取代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务委员会成员是处理南沙作战日常工作的6人小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加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汪东兴共11人。

在邓小平力促下，毛泽东1975年8月批准罗瑞卿任军委顾问。邓小平本希望有罗瑞卿辅佐其军队工作，但到次年4月自己又被撤职，总参谋长职位再度空缺。

1977年6月邓小平复职，8月十一大召开，罗瑞卿随即成为新军委秘书长（1969年4月九大以来的军委未设秘书长职位），杨成武仍是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

此时邓小平还任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关注更加重要的事务。据罗瑞卿后人回忆邓小平原本提议恢复罗瑞卿原有职务（主要是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但在高层不能通过，最终达成妥协罗瑞卿任秘书长，邓小平挂着总参谋长。邓小平交代军委三总部负责人，日常工作由罗瑞卿负责协调。

罗瑞卿即上任，9月杨成武离京任福州军区司令（挂副总参谋长直到1980年1月），同时调新疆军区司令杨勇任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列席军委常委（杨勇于1980年1月任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78年罗瑞卿去世，耿飚继任军委秘书长，邓小平还是总参谋长，1980年才由杨得志接任。毛泽东、邓小平惊人一致地排斥杨成武、启用罗瑞卿，必有当年倒罗事件的影响。

刘志坚复出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8月30日全军大单位主官调整配备时调任昆明军区政委。

萧华复出后接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77年2月调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邓小平以鲜明态度启用残疾的罗瑞卿，萧华、杨成武、刘志坚都被放在京外，直到1983年退出现役三人才回到北京，再没有恢复到先前的显赫。

四

历史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都是一次性端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却是一个一个捉出来的：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专车送至广州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再降为地委书记处书记）。几乎同时，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免职，由杨成武兼任。

上海批罗会议时彭真即被排除在之外（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要他不要接彭真从北京来的电话）。北京批罗会议彭真是主持人之一，毛泽东此时却在杭州批彭真的《二月提纲》，放风彭真有问题（吴法宪回忆，会议中途毛泽东召谢富治到杭州，叫他不要与彭真联名发言）。北京批罗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信毛泽东，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还指斥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4月当时在外地的陆定一被要求不要回北京。

4月24日叶萧杨刘上报中央关于“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5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仍在外地），彭真、陆定一仍出席了会议，但中途先后被中止参会资格，到26日会议结束时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已然形成。

逐个地捉拿彭罗陆杨，正显示倒罗瑞卿是毛泽东缜密部署、从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还不可能想到倒罗瑞卿会发展成揪斗彭罗陆杨一个集团、进而揪斗一大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与阴谋家”，而且与自己日后蹿升到副统帅竟是息息相关。

五

倒罗瑞卿事件为何成为热议而难以厘清，实因为林彪之谜的存在。彭真延安整风时崛起而进入七届政治局，在八届书记处号称副书记。杨尚昆资格很老，遵义会议时是三军团政委，抗战时华北局书记。他们的倒台怎么没有这么多关注？

1963年始林彪就是养病，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罗瑞卿与贺龙靠得近，就算有点怠慢林彪也并非不正常，要害是罗贺又与刘邓关系密切。毛泽东要实现其大目标，必然先寻找突破点、扫清外围，其中当然要有军队代表，如果不动罗瑞卿也是动别的人。林彪就算有整倒罗瑞卿的愿望也仅限于个人恩怨，且成功把握并不大。两相比较，应当是毛泽东主动出击罗瑞卿的可能性大得多。

罗瑞卿复出后，上海会议、北京会议倒罗瑞卿的关键人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亡于九一三事件前）都会回避倒罗的背景与真相。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时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表明毛泽东承认是他整了罗瑞卿，至于是否“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可谓死无对证了。

□ 原载《共识网》

~~~~~  
【文革忆往】

9 • 13 的记忆

• 王林光 •

## ◇ 凌晨，发现目标

1971年9月13日，星期一，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的大事。

那年我是空军高炮部队的一个新兵，当时驻防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桥，我所在指挥连的任务是在团指挥所战备值班。由于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军事对峙高度紧张，我们指挥所平时处于二等战斗值班状态。我们班的任务是负责有线通讯联络，用电话接听传达上级指挥所的指示通报，了解连队的战备值班状况。在指挥所平时值班的人员中，唯一能够走动的就是我们班的岗位。其余各班的人员值班时都头戴耳机，随时收听不知何时突然出现的电波信号，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高度集中，一刻也不敢怠慢。白天值班的人多一点，有事时可以替换一下。晚上就只能自己顾自己了。除此之外，安放在指挥所外的警报器由我们班负责管理，一有情况立即拉响警报。

9月13日凌晨，营房周围一片寂静，我们都已熟睡。突然，一阵金属撞击声把我惊醒，我马上意识到那是盖在警报器上的铁桶掉到地上了。紧跟着“部队一等”的喊叫，我迅速跳下床，穿好鞋子，连军装都没穿好就往外跑。这时警报声响了起来，战友们迅速跑向指挥所，进入各自的岗位。我和值班参谋同时进入作战室，看见值班的标图员正在远方图版上标示目标，一条粗黑的航迹在图版上从西北方向北京延伸。按照规定，我立即在一号线的位置上就位，接听上级指挥所的命令。

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间是凌晨4点16分。

一时间，整个指挥所各种通讯器材的响声，电话铃声，脚步声，交集在一起，但很快就安静下来。各班人员按分工查询各连队完成“部队一等”的情况。起先我们以为是上级搞例行演习，检查一下部队的战备情况，在向上级指挥所报告全团已进入一等之后，就等着听上级讲评。至于图上的目标，也以为是按照预想假设的，检查一下标图员接收信号的动作。

上级一号指挥所多次来电查询主要首长是否已就位，并通报今天不是演习，各级指挥员立即就位。值班参谋一看团首长还没到，叫联络员再一次拉响警报，又让总机通知司令部。很快，团长和参谋长气喘嘘嘘地跑进指挥所，一进门就大声问道：什么情况？作战股陈副股长简单汇报了情况，团长命令，雷达站根据远方图版的数据搜索，发现目标立即上报。

很快，团雷达站发现目标，各连指挥所分别上报已接收到雷达站发出的目标情报，得知这一情况后，团长把目光转向近方图版，看看目标到底是什么，它要干什么？我们知道，今天真不是演习，应该是有敌情了。

根据雷达通报，近方图版上显示一架飞机从西北向北京市临近。目标缓慢移动，陈副股长熟练地使用指挥尺在图上度量目标航迹，经过计算，他判断可能是直升机。经请示，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并根据已有资料分析可能是苏式米-8直升机。一架直升机来干什么？凌晨时分，天上地下一片漆黑，根本找不到目标。作战参谋立即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单架直升机的出现估计会有几种可能：一是执行伞降或机降，敌人对我地面目标进行偷袭和破坏。造成的损失应该是局部的，影响不大。何况此时天黑，如果没有地面接应，不易得手。一旦被发现，肯定有来无回。第二种可能是佯动，以单架直升机吸引我防空部队的注意力，其他大编队机群随后从各个不同方向同时或分批对我首都目标进行攻击。但只要远方警戒雷达加强对空搜索，就能及时发现目标，我们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射击准备，以对付来犯之敌。最令人担心的是第三种可能，单架直升机携带核弹，那就不好处置了。果然，上级通报直升机可能携带核武器，立即通知各连队做好防范，要有最坏的准备。

## ◇ 周恩来亲自指挥

由于目标距离太远，且飞行高度较低，处于炮瞄雷达搜索的盲区，雷达很难发现目标，这时各级指挥员都很着急，纷纷来电请示。我们也不明情况，再一次向上级一号指挥所请示。这时，我的耳机里传来了一些杂音，这在平时与一号指挥所的联络中从未出现过。是干扰信号？还是线路串音？仔细一听都不像。突然一道命令传入耳中：“大炮小炮一起开火！”怎么这样下命令？平时训练也没有这样的术语，而且声音较弱小，不是直接来自一号。因为一号使用了单向扩音设备，通话时声音很响，等待时线路里非常安静，一点杂音都没有。正犹豫时，耳机里响起一号指挥所的命令“空军首长命令大炮小炮一起开火！”我一边立即复述命令，一边迅速记录接收到命令的内容和时间。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线路已经通过一号线与空军指挥部和中央军委接通，能直接收到最高指挥机关的作战命令，这太不寻常了。然而，我传达的这道命令，却引来我们指挥所内一阵紧张。当时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见几乎所有人都看着我，团长双眼瞪了我一下，那眼神既严肃又困惑，是战士传达错了，还是自己听错了？团长也有点失去了自信。他又望了一下坐在我身边负责监听的连长，连长点了点头，算是做了肯定的回答，上级的命令确实是这样的。紧跟着报务员报告，他们从电台里也接收到了同样的命令。事后我才知道大家当时为什么那么紧张，此时全团正处于一等战斗状态，根据规定，在状态没有恢复二等以前，执行这个命令就是要开打，真炮实弹要上膛了。我们的炮阵地布防在北京的东南部，而目标出现在北京的西北方向，此时我们全团的炮口都正指向北京城，这个时候不紧张才怪呢。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这支部队就担负着保卫北京的防空任务，从未搞过实弹射击。平时我们常说，保卫北京的部队是里三层外三层，我们是最里层，真要轮到动手，说明已经相当危急了。而今天，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不明，且目标离我们又那么远，射程够不着，却命令我们开火，确实让人不可理解。难怪大家听到这条命令时，都用各种眼神看着我。

其实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根本没时间让你去讨论，军人的职责就是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上级下达这样的命令，可见要击落目标的决心。只见团长果断地拿起话筒向全团下达了“供弹”的命令。这个命令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迅速传达到各战斗连队，情况严峻的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紧接着，又一道命令传来：“没有命令不许开火！”耳机里我听到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但又想不起来，这声音既坚定又沉稳，想多听一句，又没有了。随即一号指挥所重复了刚才那道命令：“总理指示，没有命令不许开火！”对，是总理的声音！虽未直接聆听过，但在广播、电影里还是听过多次的。我立即复述了总理的命令并做下记录，一看表，天那！这两道相互矛盾一打一停的命令下达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分钟的间隔。太快了，简直让人无法适应。人们常说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今天算是真正领教了。是周总理亲自连线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直接指挥我们今天的战斗。得知这一消息，指挥所内的气氛更加严肃了，团长立刻向各连下达了停止供弹的命令。

指挥所里，我们把全团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指示，要我们按照部署，各连队向自己担负的防卫空域实施警戒。我们团的环视雷达继续监视这架来历不明的直升机。此时它正在延庆、昌平一带上空盘旋，高度不高，速度很慢。突然，标图员用红笔在图上点了一下，很快划出一道轨迹并报告：发现目标小型机两架，高度××！这一情况我们迅速上报并请示目标性质，上级通报是我空军的歼击机升空执行拦截任务。上空有我机，我们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根据空炮协同的作战预案分工，目标将由歼击机负责，我们高炮只担负对我机的掩护任务。可是歼击机并不向直升机开火，而是围绕它不停地盘旋，看来是想要迫降直升机。由于这两种机型的航速相差太大，歼击机盘旋的飞行半径很大，而直升机几乎原地不

动。标图员在图上一圈又一圈地画圆，画重了擦掉，擦了又画。这样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歼击机有返航的，又有升空的，轮番对直升机实施迫降，直到直升机目标从我们雷达中消失。这时，天已大亮了。

#### ◇ 目标消失以后

上级指挥所通报目标已消失，但还是没有下达恢复二等的命令，要求各部队根据防空预案向各自的警戒空域搜索，发现可疑目标立即上报。

天上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地上的问题就来了。各连队纷纷请示炮瞄雷达可否关机？原来炮瞄雷达开机时间太长，许多零部件发热易损，尤其核心部件磁控管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极易损坏。加上发电机长时间开机，油料消耗很大，各连纷纷告急。的确，从凌晨部队进入一等到目标消失，时间过了两个多小时，后面还不知道要持续多长时间，经请示，上级同意我们火炮停止联动，但人员在阵地待命，不许离开。油机关闭一台，另一台保持对雷达开机供电，全团的炮瞄雷达按命令轮流升降高压，向各自负责的警戒方向搜索。同时我们立即通知后勤部门迅速向各连运送油料，做好长时间战斗的准备。

直到忙完了最后一阵，基本上就没什么令人紧张的事情了。可我们指挥所内仍然是一等全员上岗，首长们也一步不离岗位，胥政委不知什么时候也进了指挥所，他平时是不到这里来的，今天却搬了一张凳子坐到我的桌子旁边，也许他也想早一点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可通往上级指挥所的电话是那样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此时首都上空同样宁静，一架飞机也没有——所有的民航班机全部取消了。

天亮了，连长请示团长后，让炊事班把饭菜直接送到指挥所外，我们和首长分批轮流就餐，谁也不敢远离指挥所半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下去。由于是全勤值班，各班人员根本轮换不过来。我们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值班。大约三天后，才有了民航班机的过航通报，任何一架飞机的起降都要事先经过上级批准，并提前通报给各部队，北京上空的飞行秩序才慢慢恢复。

这样的日子直到国庆节后才逐步恢复正常。事后才知道，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劫持了一架直升机准备外逃，被飞行员陈修文发现，他趁着夜色悄悄掉头返航。这才有了——一架直升机从张家口向北京临近的一幕。直到天亮，劫机者发现并没有飞出国境，又见有歼击机拦截，只好迫降在昌平附近，被地面的北京卫戍部队控制。而当年，是在一个多月后，传达了中央文件，我们才知道发生了9·13事件。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我们师的叶副政委是叶群的弟弟，更感觉到了异乎寻常的震动。我经历了国家发生的如此重大的事件，虽没放一枪一弹，却是那样惊心动魄，以至于许多年后仍不能忘却。

（作者为当时北空高炮部队战士）

□ 《炎黄春秋》2016年第2期

#### 【文革反思】

文革浪漫主义为何失败？

• 萧功秦 •

毛泽东从左的革命者的角度来批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他的革命浪漫主义难以适应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保守化”的秩序，他先是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再进一步发动文革，两次向“安分敬制”的结构发起冲击，形成激进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

文革浪漫主义的失败，导向了以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社会流动性，竞争性的结构，在中国形成，从大历史角度看，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中国正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 一、建国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与激进民粹动员的结合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抗战后期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来引导中国的发展，第二种选择是，恢复革命动员时代的“超阶段论”，即通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与冷战时代的到来，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二则由于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胜利后的人们自然认为，斯大林式的党政全控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形态。三则由于落后大国统一后往往有强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愿，而通过低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重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积累，就成为政治决策者的必然选择。所有以上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后的中国没有选择容纳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选择了苏联的党国一体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建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单位制、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计划体制，这种道路选择，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条块组织结构里，它与传统帝国文明的体制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而它的集权控制程度则更高。这种以户籍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安分敬制”结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刊上就宣传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以“分”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在秩序上对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

从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变化：单位取代了自主的社会；金字塔型的条块分割，取代了利益主体的契约关系；板块结构取代了横向的利益交换；计划代替了市场，计划官僚取代了企业家，集体淹没了个体，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闭管理性代替了社会自由流动性；上令下达的经济指令，代替了自主经营。这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全面变化，使社会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社会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观竞争的环境与条件全面被体制剥夺，个体成为集体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社会个体从此就在体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齐排列的砖石一样的角色定位。计划体制以此来实现整体功能，排斥一切社会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使社会成员都没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农民要进城，都必须由大队开证明，生老病死的问题全在一个封闭的单位里解决。这是传统“安分敬制”纲常结构在革命的名义下翻版。这无疑是不自觉地结构回归。

对这些结构要件变化的罗列，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现在那些仍然对改革以前那个时代具有浪漫怀旧情怀的人们，他们更有必要理解这份变化要件的清单。

在这种结构里，同质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级工资制，用角色功能划分等级，以“分”的方式来避免同质体之间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家来说，这种带有军事集权命令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后，它所具有的民族动员力，资金积累能力，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能力，为推进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工业基础，也确实做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也确实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区两个强劳动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来（合一角钱），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黑市上价格一角一分钱），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后国家还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产生大量的浪费与低效。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当官做老爷”的长官意志与官僚病不可避免。

## 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解释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工业化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安分敬制”结构，那么，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动员性因素，例如群众运动，意志决定论，供给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超阶段论”思想，等等。这些历史因素曾在革命时代起到动员大众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支配下，进一步膨胀起来。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共和国体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复活，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作为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传人，他对传统文明中的这种负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试图运用自己作为革命导师的威望与权力，以民粹主义的动员与暴力革命的斗争哲学，来削除这种“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对“八级工资制”的等级观的厌恶，对“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事实上的等级秩序的难以接受，都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安分敬制”文化的轻蔑。然而，毛泽东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实现铲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要在短期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浪漫主义理想，在民众与干部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极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执掌的高度动员能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自195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实施乌托邦工程的苦难时代，在体制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后果就具有灾难性。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毛的乌托邦失败了。刘少奇与务实派政治精英，从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迷思中觉醒过来，从1962年后实施了三年的调整政策，到1965年前后，终于重新恢复了计划经济秩序。

当政者从大跃进以来推行的民粹主义化的高度动员的激进平均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计划官僚以“分”为基础的等级制上来了。相对于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泽东仍然顽强地认为，他的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对刘少奇这些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取代了革命战争时代供给制的计划经济官僚制、八级工资制与等级分配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为了让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他心目中以复归供给制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施工蓝图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但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只会对生产力造成更加巨大的破坏与灾难。

### 三、从文明史的角度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从全能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入了真正的起飞阶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开明的威权体制，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稳定社会，防止出现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并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离析了出来，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当然，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则为其施政基础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来说，这肯定是不稳定的，如何从人治向法制转变，也将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大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适应这种社会多元性的制度变革也将水到渠成地到来。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 原载《共识网》

~~~~~

【文革一页】

对文革初期郭沫若“焚书声明”的回顾

• 章继光 •

50年前的1966年4月下旬，郭沫若发表“焚书声明”，他宣布要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这是“文革”初期举国轰动的大事件。现在的年轻人乍听这事，认为可能是搞笑的“八卦”或荒诞无凭的野史，但它的确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发生过的一幕，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此不会淡忘。

这件事的由来是这样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后，通过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将“大批判”的烈火从北京烧向全国。面对这种局势，毕生从事文化工作的郭沫若内心充满紧张与不安。1966年元月，新年刚过，他向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交了辞职信，表示辞去中科院院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务，但未获批准。这年4月，主要由江青炮制的（以林彪委托的名义）《部队文艺工作会谈纪要》发表。（注）这个文件指出，建国以来的文艺界实际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政，号召人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一场批判封、资、修，围剿“文艺黑线”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4月14日郭沫若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随后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与中国文联主席的他在会上作了一个表态性的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道：

“……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

郭的这篇讲话经康生送毛泽东批阅后，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标题全文登出，5月5日《人民日报》随后转载。此文发表后，举国震动，影响巨大。当时，很多人不明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大家只看到文化层面的东西，既然号称“文革”，文化首当其冲，整个文化界都将受到冲击，不少文化人士对此顾虑重重，忧心忡忡。郭沫若这一令举世震惊的表态加深了人们的忧虑。

郭沫若在中国文化界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20世纪很有影响的诗人和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古文字学（金文、甲骨文）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作，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他的《屈原》、《蔡文姬》等历史剧为中国新型历史话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公认为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和两周金文的研究被古文字领域公认为是取得重要突破的成果（主要凭借这方面的成绩，他于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但郭未接受）。郭沫若著作宏富。已出版的规模宏大的《郭沫若全集》，计有文学编二十卷，历史编八卷，考古编十卷。

由于郭沫若创作和学术的成就，加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年以来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得到中央信任，并担任重要职务，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多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多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

郭沫若为什么会在当时发表一个这样的讲话？

现在看来，郭选择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发表这一讲话，大致包含了这几方面因素：

一，对“文革”这场来势凶猛运动的恐惧

作为一个从“五四”以来就发表过大量作品、著作，享有高度声望的诗人、剧作家和学者，他知道自己既和旧政权也和所谓建国后的“黑线”脱不了干系，担心自己和自己的著作

随时有可能拿出来批判，内心充满恐惧，心想，面对惊雷滚滚的“文革”风暴，与其到时被动被批，不如现在主动缴械投降，以“认罪”式的表态获得毛主席、党中央的从宽处理。

二，表现出他作为传统文人的脆弱

不容否认，郭沫若有过重要的革命经历，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和蒋介石作过斗争，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投身进步的民主斗争。但在他身上毕竟又有着中国传统文人脆弱、敏感的一面，作为一个经历了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文化人士，因这种脆弱和敏感，他在文革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内心的精神防线已然坍塌，于是选择以这种“自首”的方式自赎。

三，表达对“文革”的竭诚拥护

从大革命时期直至40年代，郭沫若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建国后他才得到重用。对此郭沫若满心充满感戴，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各项政策方针都竭诚拥护。对于声势浩大的“文革”，他固然也有着疑虑和担心，但他不能也绝不会唱反调，于是率先通过人大常委会这一重要平台，以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态度，向毛泽东表达对“文革”服从和拥护，以图获得最高领袖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郭沫若的这一表态通过几份极有影响的报纸刊发，并在中央电台播送以后，无异于在文化教育界投下一颗原子弹。试想，以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作家，以他在文化界如此之高的地位，对自己的评价尚且一文不值，那么等而下之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包括他们的所有作品、著作之类还有甚么价值可言呢？在这场大革命中将它们“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郭沫若的这份声明以“不批自倒”、自我否定的表态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重要和十分及时的！它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文革之初大破“四旧”、践踏、毁灭文化，批判“封资修”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口实和最好的教材。

郭沫若此文发表以后，犹如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中带来一片惊恐。为避免留下口实或“罪证”，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将著作、讲稿、手稿连同珍贵的信札、照片等扔进厕所，或者烧毁；有的艺术家将悉心保存的道具、剧照丢入垃圾堆。当时，失去教职、栖身上海的著名画家林风眠，看到这个讲话后，绝望的他下决心采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消灭自己的全部作品，将多年积存的三千幅画作在浴缸中一张张浸泡、踩成纸浆，然后冲入下水道；年届八旬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以同样的办法将毕生积累的书法作品及收藏的明清书画珍品在澡盆里泡成纸浆后，由家人在夜色中倒入苏州河……

毁灭的岂止是文化珍藏？对于广大的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关于信仰、前途与中国命运的的巨大忧虑。

笔者从《光明日报》上见到郭沫若这篇文章时，是一个面临毕业分配的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自己对于郭沫若一直心存景仰。虽然此前和同学们一道经历了校、系组织的1965至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系列作品和“文艺黑线”声势浩大的“文革”前哨战，对中国当代文艺的认知已然麻木，但读了郭沫若的文章之后，心头还是猛然一震，不理解以郭沫若这样有声望的文化学术界前辈，为什么会作如此一鸣惊人的表态。真如他所说的，之前所写的东西一无是处，应该全部烧掉，那历史上又该有多少作家学者的著作值得保留的？既然如此，关于中国文化和整个中

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一个个问号悬在心头。而在它们后面则是一个更大的疑问：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何在？

心存疑问的绝不只是笔者一人，这也是全国大多数高校学子和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共同困惑。但这在当时是不能公开说出的，只能掩藏在心底。响彻校园高音喇叭的阵阵浪潮似乎要把人们心头这些疑惑摧毁，不容自己有任何怀疑。于是绝望之下有同学将大学四年中视为宝贝的教材、笔记全部送到了废品收购站。

就在郭沫若“焚书声明”发表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5月4日至26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遭到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5月31日，陈伯达宣布改组《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由陈伯达授意、修改、审定），社论号召“亿万工农兵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人民日报》的“6.1”社论，将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活动迅速推向高潮。神州大地烽烟四起，浊浪排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黄帝陵炸了，炎帝陵炸了，孔庙砸了，孔林毁了，连西湖边岳飞的坟、秋瑾的墓也挖了，包括“五岳”在内的名山寺院、道观在短短时间内悉数砸烂，无数家庭的藏书被造反派收缴一空，焚烧殆尽……据不完全统计，文革初期仅天津市被毁文物、字画就达22万件，浙江宁波地区被捣成纸浆的明清古籍有数万吨之多。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热浪潮中，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打击、迫害，五千年炎黄文化蒙受了一场巨大的劫难。

面对“文革”这场浩劫，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文化界固然不乏梁漱溟、陈寅恪、傅雷那样持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文化信念的学者，而其中的大多数只能以沉默来表示不满。无庸讳言，像郭沫若这样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在风云突变之初，抛出这样一份“焚书声明”，客观上助长了否定人类文化成果，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革”思潮，不仅使在深挖“胡风集团”和“反右”斗争等一系列运动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和压力，而且迫使他们效法“声明”，反省自己的“原罪”，自愿接受这场风暴的冲击和“洗礼”。“焚书声明”在“文革”初期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由于郭沫若对“文革”表态鲜明，行动积极，他本人因此被列入最高领袖毛泽东批准的保护名单，并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江青一伙并没有放过他，他本人不仅遭到造反派大字报的口诛笔伐，在“批林批孔”中，江青、张春桥还登门逼迫他写出检讨和批判自己著作的文章；他的家庭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三子郭明英自杀身亡，二子郭世英在被红卫兵关押中活活打死，他本人和夫人于立群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由于文革中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终于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喊出了自己积压十年的心声。

（注）据《邱会作回忆录》，林彪对江青搞的这个文件并未认真看过，对江青假托他的名义炮制出这个《纪要》曾流露出反感。

□ 原载《共识网》

~~~~~

## 【往事如烟】

### 秘书眼中的罗瑞卿

• 王仲方 •

—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但是在“文革”前夜，他不幸蒙难，度过了10年的艰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又是他公开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今天，曾经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将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

1966年春节，王仲方从外地回到北京，想去看望他的老领导罗瑞卿，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看到。

王仲方（以下简称王）：因为罗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他，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人揭发他，说他1951年到广州去考察工作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很奢侈，毛主席还点了他的名，他挺紧张的，因为那次是跟他一道出去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就帮着罗瑞卿写了个检讨，毛主席看了很满意，就算过关了。所以这次我心里想，罗瑞卿这又出事了，是不是我再去帮他去写写检讨吧，秘书讲你千万别来，说现在情况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没有去。

后来，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得知了罗瑞卿的进一步消息。1966年3月18日，面对批判无处申辩的罗瑞卿从家中的阁楼跳下，他没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从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

王：上海会议以后，北京就开了个军委会批判罗瑞卿。后来就上纲，越上越高，搞得罗瑞卿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最后罗瑞卿跳楼自杀。缎库胡同三层小楼，是两层，上面一层叫做阁楼，就是放东西的，很低，他就从阁楼的窗子里爬出来跳下来的。那个楼不算高，四五层下来的话，他早就摔死了。

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了解到，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此时，王仲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判断自己难免会受到牵连。

王：罗瑞卿问题出来以后，虽然主要是军队的问题，没有牵涉到公安。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而且在他的身边工作这么久，关系又比较密切，我们有这个弊病，就是哪一个人出了事以后，就要从他祖宗三代查起，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绩，也要肃清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跑不了了。

1949年，中央筹建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北平，让他担任公安部部长。7月，罗瑞卿走马上任，公安部每天等他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正是在这一时期，王仲方到罗瑞卿身边，当上了他的政治秘书。

王：要找个适当的人去罗瑞卿身边工作，可是大家很踌躇，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办事快捷，而且要求很严，如果要是有些地方有时候搞得不对，他批评是很严的，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儿去工作。拖了很久以后，文件、电报积压得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我来试一试，不合适的话，再换人。

在王仲方看来，罗瑞卿虽然以严肃闻名，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讲人情。早在延安时期，王仲方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时，就曾给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过意见。

王：罗瑞卿讲课讲了一个多月以后，征求大家意见，说同学们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你讲得好，没意见。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你到这里讲了一两个月的课了，从来都没看见你笑过，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大后方来的学生们有意见。罗瑞卿很动感情地说，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看不起你们，对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我是满心高兴的，可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在红军作战的时候，嘴部负伤了，嘴巴张不开，所以说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还请你们大家原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罗瑞卿的认可。

王：一去的时候，我说我是你的学生，抗大三期学生。罗瑞卿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王仲方说，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着保障安全和稳定社会的重任。

王：国民党特务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乱，那时他们就在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纵火，几十辆电车都烧掉了。那时候电车本来就不多，所以特务想造成交通混乱，人心也就不安定了。当时类似这样的破坏活动可不少。比如说有个辅华火药厂爆炸，有个翠明庄，国共和谈的时候，中调处执行部就在那里，叶剑英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住，突然起火了。当时不是这个地方冒烟，就是那里起火，搞得挺紧张。

## 二

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开展了“镇反”等运动，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此外，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秘书王仲方说：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所以才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1951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开展了“镇反”运动。

王：这个事情在全国发动以后，抓了一大批人，也杀了一大批人。当时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被抓起来以后，采取杀人以前贴布告的方式，说什么人犯罪了，犯的什么罪。另外，枪毙罪犯是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就是让这些留下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动，你要是再搞破坏活动，我立刻就镇压你。所以镇反运动，搞了一年多，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1951年5月，全国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开的破坏活动减少了，但隐蔽的特务活动日益增多。罗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王：所以那时候就给广东省公安厅做了工作，加强他们的力量，就是做到炸弹不允许过韶关。

绝大多数特务活动被阻止在中国的南大门，但也有少数漏网的特务潜入北京。1954年6月，蒋介石派出外号“赛狸猫”的飞贼段云鹏，目标直指中央最高领导人。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开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建国后，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得知段云鹏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央领导人的消息后，罗瑞卿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1954年国庆节前，公安系统布下罗网，活捉了飞贼段云鹏。

王：抓住他以后，罗瑞卿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挺高兴地说，这个人把他抓住挺好，说是不是他轻功很好，是不是让他飞一个，我们看一看。

经过“镇反”运动，又打赢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工作连连告捷。1956年，这是全国发生案件最少的一年，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让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闭户，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放心了。路不拾遗，就是拾到东西以后，不据为己有，连小学生都会将捡到的一毛钱交给交通警。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治安情况确实是最好的一年。在王仲方眼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护卫毛泽东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

王：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桥剧场去看戏，罗瑞卿不放心，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剧场周围安全保卫怎么样，包括警卫的安置。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他要先去试一试。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都是罗瑞卿亲自陪同他。每年的5月1日、10月1日，天安门要开大会，晚上还有晚会，罗瑞卿经常都在毛主席身边，所以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当然了，其他的领导人的安全，他也关心，但是他对毛主席的安全，是觉得自己特别负了一个特别的责任。

建国初期，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惯例先报到政务院，毛泽东看不到公安部的报告，就专门把罗瑞卿找去提出批评。

王：毛主席批评他，说是你们烧香找错了庙门，公安工作这么重要的部门，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找我？周总理解释说，他们报告是有的，送到我这里了，我没有转给你。把罗瑞卿搞得挺紧张，所以回来以后，赶快给我们办公厅这些人讲，以后要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当时规定我们每个月要写一次综合报告。

此后，公安部很快完备了直接向毛泽东本人的请示报告制度。王仲方说，那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

王：我们知道毛主席和罗瑞卿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也很爱护罗瑞卿，罗瑞卿如果有什么毛病，别人有什么反映，他就告诉罗瑞卿，说你要注意；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就让罗瑞卿亲自到那位领导人那里去说明情况。



罗瑞卿凡事求好求快，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曾经给予提醒。

王：毛主席曾经提醒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当然他也比较注意了，但是他这个严肃是有名的。

### 三

1959年，罗瑞卿离开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战线。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后，王仲方也从公安部调到了青海省委工作。

王：1965年是他的事业的高峰，因为这个时期他是军委的秘书长，军委的常委，林彪又经常生病，实际上是由他来主持工作，虽然名义上是由贺龙来主持工作，但是实际上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当时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报告，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本来由林彪来做的，林彪不能出来，所以就由他来做，这个报告真是震动全国，影响也很大。可以说那个时候罗瑞卿真是“意气风发”，而且工作从各方面来讲，又都很顺利。

1965年，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

王：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师，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

1965年11月，上海会议前9天，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谈话过程也相当平和。此后，罗瑞卿按计划飞往大西南察看地形。

王：我感觉他没有感觉到好像会有什么，因为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如果他有什么不合适了，毛泽东会提醒他。所以搞一个突然袭击，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这个突然袭击面前，他受不了了。在上海会议以前，他心里毫无准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是“上海紧急会议”。会前，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都不清楚会议的内容，见面的时候还互相打听。而在会议的前三天，罗瑞卿并没有到会，只是到12月11日，接周恩来的电话通知，罗瑞卿才赶到上海参加会议。当时的罗瑞卿，并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已经来临。

王：讲到上海会议，他挨整那一次，当然这个上海会议，是一个谜，究竟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开上海会议，而且把罗瑞卿拿下来。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王仲方因为健康问题正在上海治病。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到上海参加会议，王仲方到锦江饭店去见这位老朋友，因此得知了上海会议召开的。但是对于王仲方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与中央的其他会议有什么不同。

王：中央开会，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经常出席，所以觉得一年都要开一两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仲方事后得知，上海会议与他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气氛大不相同。

这次的会议特别保密，所有的秘书、随员，都不能参与，文件本来都是由秘书来保管的，这次不要秘书保管，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局长，亲自把文件送到每个人口袋里，每个人发一个小的保险柜，放里头，不让任何人接触。所以这个会议开始以后，气氛就非常神秘。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但罗瑞卿夫妇并没有踏进锦江饭店的大门，被汽车直接拉到一个小院子里软禁起来。

王：上海会议半截的时候让他来的，他在云南边境上察看地形，然后被通知来开会。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还在处理文件，等下了飞机以后，进了住的地方，周总理和邓小平告诉他，他才大吃一惊。

很快，上海会议的内容就在党内传达了，会上集中讨论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三大问题。

王：那是上海会议完了以后，上海市委的副书记就给我传达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想象。不久，胡耀邦到了上海，我还给胡耀邦讲：这是怎么回事？胡耀邦说：不要紧，罗瑞卿现在虽然军队的职务免了，但是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现在还没免嘛，毛主席跟他关系那么好，不会把他怎么样。

从罗瑞卿个人的灾难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在中国蔓延。1967年4月，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解罗瑞卿的消息。正如他自己的判断，作为一名老公安，罗瑞卿曾经的秘书，在那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之下，他也没有躲避的可能。

王：周总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就问王仲方同志现在哪里？有人说是现在已经给隔离反省了。林彪当时在场说，王仲方，我到处找他找不到，他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罗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刘贤权他们回到青海，就把我抓起来了。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罗瑞卿怎么控制、指挥上海的公安机关，江青在上海的时候，怎么派人跟踪监视她，窃听她的电话。我说这个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你只要把这个交代了，我们立刻放你。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们问了好几次，后来拍桌子说：你不交代，你就给罗瑞卿垫背吧。

5年多的牢狱生活，王仲方依靠鲁滨孙精神鼓励自己撑下去。直到有一天，凭着看守的一个举动，王仲方判断他的问题可能出现转机。

王：林彪的飞机爆炸以后，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察觉了。因为有一天突然这个看守员，把我的监房打开，把我看的书，都给收走了。过了两天，又还回来了，还回来一看，什么“老三篇”，还有什么毛主席语录，凡是林彪在上面写了字的，都撕掉了。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到了这种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

在监狱里，王仲方每天还能读到《青海日报》。1971年，他发现报纸上突然看不到有关林彪的任何消息，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判断：林彪出事了。王仲方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1972年，王仲方结束了6年的监禁生活。而第二年，时隔10年之后，他重新见到了罗瑞卿。

王：我去看他时，他坐在沙发上。他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握手，半天都没说话。后来我就讲起了我的情况，说是我的老父亲，他认识，也被饿死、整死了。他挺难过，说是想不到怎么会牵涉到你的父亲。

1977年，罗瑞卿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已经70多岁的他自我激励要做“拼命三郎”，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8年，胡耀邦审阅定稿，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罗瑞卿用行动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王：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结果华国锋不赞成，另外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不赞成，后来还有一些人也都不赞成。紧接着还有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再一次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党校来组织，胡耀邦不好出面了，就交给罗瑞卿。罗瑞卿说行，我来搞。结果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解放军报社，罗瑞卿亲自看了好几次，改了好几次，这篇文章的影响对“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

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依然盛行，罗瑞卿的举动在旁人看来要冒一定风险。王仲方说，1978年6月下旬，罗瑞卿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决心非常坚定。

王：有人对罗瑞卿讲，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不要发表。罗瑞卿说，不要紧，《人民日报》不能发表，《解放军报》发表，他不是那时候管军队工作嘛。如果要打板子，打我，你们发表吧。所以那篇文章一发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力量就更大了，小平同志也出来说话了，后来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思想先导。

恢复工作以后，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动不便，无法像从前一样到各地视察和调研，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甩掉轮椅，行动自如。

王：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腿可以治好。最好是去西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是罗瑞卿的老战友，说到西德去，我肯定帮你，给你治好。罗瑞卿当时希望能够自由行动、工作，他就去了。

罗瑞卿临行前，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当时罗瑞卿除了腿脚不便之外，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王仲方说，他当时并不赞同罗瑞卿去德国治疗。

王：到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医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就临时换了个医生，这个医生不熟悉他的身体状况。到了西德，手术非常成功，关节也换得很好，外国医生告诉他说，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还挺高兴的。可是到了半夜，他的心脏支持不了了，因为全身麻醉影响心脏，所以他也觉得不行了，赶快就说：心口不舒服。等到夫人郝治平赶来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 原载《纵横》2008年第7期

~~~~~  
【书刊评论】

《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推荐语

• 启 之 •

此书是为毛泽东“平反辟谣”、“拨乱反正”之书。作者谢静宜，长春军事机要学校毕业，长期任毛泽东的机要员，与毛、江及李讷、李敏甚熟，如同毛氏一家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受毛泽东重用，先是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的身份，与8341部队一道入主清华、北大。后来出任清华、北大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中央委员。出入政治局会议，传递最高指示，游走于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大内总管汪东兴之间。

“我作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之一，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这是她的夫子自道。怀抱着这样的目的，她像权延赤、李银桥、胡乔木等人一样，写毛泽东的种种伟大，种种英明，种种不同凡响。怀抱着这样的目的，她对有损于毛泽东形象的说法，都做了尽可能的清理。

然而，作者的“公道话”，放在事实面前，却露出了皮袍下之小，在令人徒增了困惑的同时，也给她自己出了难题。随便举几个例子——

书中说，主席喜欢看从基层来的第一手材料，不喜欢看“穿靴戴帽”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主席对她说：“送到这里来的材料，往往是经过几道修饰，面目全非了，没多大意思。”“我喜欢开门见山，不喜欢一个文件里夹杂着很多废话，看了很久，还没见内容是什么。”这里的所谓废话“是指当时很多报告前面总加一些‘在毛主席、党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关怀指示下……还有语录、万岁等等’毛主席称之为废话。”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作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要长期忍受这些废话？且至死不思改变呢？

书中说，毛泽东懂得农业知识，反对虚报浮夸，他知道童言无欺，知道成人跟他说的是假话。“一次，我对主席说：‘参观天津郊区实验田我没去成，听说小孩子坐上去了掉不下来，还说把鸡蛋放在稻穗上滚，滚来滚去也掉不下来，是真的吗？’主席冷笑着说：‘是假的，这是自欺欺人，可别相信。’又说‘真正懂得一点农业知识的人是不会上当的。’过一会他又生气地说：‘这种做法会害死人啊……’”。作者还提到，毛泽东到村里了解情况。干部社员都说有粮吃有肉吃，请主席放心。主席问一个孩子能吃到肉否？孩子说“没吃过，过年时才吃一点点。”主席遂对作者说：“我相信孩子说的是真话。”看到这里，读者的疑问又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继续纵容浮夸风？继续鼓励人们说假话？终至酿成三年人祸？饿死几千万人呢？

书中还说，毛泽东深知专案之弊，反对逼供信。1969年5月，作者到中南海游泳池见主席，主席同她谈到专案工作：“有的专案人员专搞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水分可大啦。搞专案的一些人总希望他搞出的问题越多越好，性质越严重越好。这样好像他的工作成绩越大啊！逼供信来的东西，你才别相信呢。靠不住。你一逼，他就供；他一供，你就信。逼出来的东西你能信吗？”“当然，对专案人员，要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可是你想否定他们专案组的东西可难啦，他们搞的那些东西，自以为成绩大得很呀！有功劳呀！不得了啊！”“专案工作的成绩，不是在于问题越多越好，越严重越好，而

是在于一个字‘清’，清本身就是严。”在引述了这些最高指示以后，谢静宜评论道：“我认为，主席对专案工作这一席话，决不仅仅是对清华、北大造反派搞专案的看法。从我对主席的了解，从主席讲话时的语气、神态看，他是对全国上下各级专案工作的普遍看法，是对全国各级专案工作不满意而进行的批评、指示。”如果真如作者这么说的，那么，人们就更有理由追问，既然毛泽东对专案工作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为什么还让专案组弄出来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为什么他还相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书中有一节的题目是“毛主席反对个人崇拜”。作者说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她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事。毛不知道像章的事。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她拿着自己攒的像章给主席看。主席脸色严肃，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又说，“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作者说，毛对“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忠字操”等“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毫不知情。当她与毛谈起这些事的时候，“主席说：‘荒唐！’”随即“皱起眉头，陷入沉思。”1968年5月，她发现她的丈夫苏延勋的自行车上挂上了语录牌，而大街上几乎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她告诉毛，“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行，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1969年九大后，她到北京市委开会，在招待所吃饭，人们得先念语录，卖饭的与买饭的也要互念语录。主席听她报告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这一节的结尾，作者说，由于毛发出了两次降温的指示，“这股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风得到了遏制。”这里，作者给自己出了难题——毛既然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为什么林彪搞大搞对他的个人崇拜能够得逞？主席每天看那么文件报刊大报小报，为什么对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红海洋视而不见？毛既然能给个人崇拜降温，为什么直到九大以后才想起来遏制？简言之，没有他的同意默许鼓励支持，个人崇拜怎么能搞起来？

此书的第三部分专讲毛泽东如何保护干部，如何关爱知识分子。其中提到了毛对田家英、王良恩自杀的反应，提到了毛对几位老师的保护，提到了毛如何解放了蒋南翔、陆平，如何关怀侯宝林、钱伟长、刘仙洲、冯友兰、梁思成等人。作者写这些，似乎完全不知道毛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知道历次运动中死了多少知识精英。

与所有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人一样，谢静宜在无意之中变了一个戏法——把主席从最高决策者变成了对现实不满的黔首小民。不过，在戏法的技艺上，主席是她的师傅——毛泽东喜欢为下层人说话，喜欢发政策的牢骚，喜欢把自己的屁股，从党和政府的沙发上，搬到了农民的土炕上。“我一听到农民瞒产就高兴，藏粮于民，好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毛泽东在说这些话时，把自己从一个生杀予夺的现代秦始皇，变成了一个反主流、反体制，为民请命的义士。

谢静宜不知道，越把主席说成一个知晓一切恶政，反对一切恶德的伟人，这些恶的普遍存在和经久不歇，就会越损害主席的形象。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讨回公道的最好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启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

##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一）

• 钱理群 •

——读《一百个人的十年》、《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我们忏悔》、《1966：我们那代的回忆》〔1〕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这里讨论的文本，强调的是文革中的“我们”与“普通人”，这是因为文革与以往所有的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全民参与性。一位文革亲历者这样写道：“文革烈火所以能够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为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的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2〕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准确的概括。这层意思在老百姓口里，就说得更加直接而坦率：“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3〕“‘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4〕

这样的全民参与，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作家夏衍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5〕第一句讲的是文革之“道”：“人需整”确实是文革的基本理念与目标：不仅要“整”文革的革命对象：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整”自己，进行“斗私批修”，改造思想。在这两个意义上，都可以说文革就是一个“整人运动”。后两句说的是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整人”与“被人整”。如研究者所说，文革就是“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每个人都是中央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旗手决定的”，“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就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无人逃脱。〔6〕对此，文革时期的北京四中学生、著名导演陈凯歌也有一个概括：“我是群氓中的一份子”，“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7〕还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她的文革回忆集中为一句话：“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8〕这是一个更全面、准确的概括：在文革中，每个中国人都同时是受害者，施害者与看客，无人例外。

这每一个角色，都会引发追问：怎样和为什么受害？怎样和为什么施害于人？怎样和为什么充当看客？这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深层次的人性、国民性和教育、体制问题？这都是本文所要谈及的话题。

我们的讨论，也分为两大部分：先谈“怎样”，作现象的描述；再问“为什么”，作历史与理论的溯源。写法也是多抄材料（当事人的回忆与反思），只作点题式的评论，也可以说是“夹叙夹议，寓分析于叙述中”。

## 第一部分 全民参与的“革命”

### （一）“忠字化”小忆

这是文革中正在部队当兵的吴非记忆中的“那个年代”——

“当时，不光是人人胸前要佩带越大越好的毛主席像章，所有的单位、机关、厂矿、校园、营房里，还都要在中心及惹眼的位置上，塑起高大的毛主席像，其中既有彩色的大幅画像，也有分别取站姿、坐姿的塑像和雕像。据说，革命群众只要一时一刻见不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就会‘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工作无动力，吃饭都不香……’。

‘忠字化’这个说法，在那个年代，很快就被广大群众所自觉地实行了。人人都要一天多次引吭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表‘忠心’的歌还不算，不知是谁又创造地发明了一套‘忠字舞’。所谓‘跳忠字舞’就是大家集合在一处，在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的同时，再手舞足蹈，做出天上高悬红日一轮，自己心窝里崇拜领袖之类的象征性姿势。每天早八点，各单位上班的那一刻，是社会上约定好大跳忠字舞的准点儿，人们都得走出大门，到街道上狂舞一番。此时，经过这里的路人也必须驻足同舞。假如他想若无其事地通过可是万万不能的，跳舞的人会对你怒喝一声：‘你什么出身？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

大讲‘忠字化’语言，又掀起了大浪头。毛主席诗词、‘老三篇’、‘最新最高指示’，本来就要求‘融化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就更别说必须做到张口就来了。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先得像地下工作‘对暗号’一样，严丝合缝地对上一句毛主席的话（或者是歌颂毛主席的话），否则，你有什么事情找人家办，对方也不会理你。记得有一回我在石家庄，慕名去买当地很有名的‘扒鸡’，交了钱，对方突然说了句‘翻身不忘共产党！’。我没细想，也没言语，只顾伸手去接鸡。不想售货员果断地把鸡收了回去，重新厉声吼道：‘翻身不忘共产党！’我这才恍然大悟，急中生智，高呼一句‘吃鸡不忘毛主席！’对方这才很郑重地把鸡递到我手里。……

‘忠字化’登峰造极的那阵子，人们在一切场合里，只要一开口讲话，必须先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当时叫‘最高指示’。讲话不先引用语录，或者引了语录却跟要讲的话没关系，都是‘不忠’的表现。所以，大家张嘴第一句，总得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而，并不是日常的每件事，老人家都作过指示的呀，这可就叫人时不时地犯难，人们只好挖空心思地查阅‘红宝书’。我所在的部队里，某连司务长在周末向全连汇报伙食收支账目。他开口就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又亏了！’政治指导员顿时就火了，过去制止他：‘你胡说什么？毛主席啥时候有过这样的最高指示？’司务长胸有成竹地说：‘请大家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小资产阶级……发财观念极重，……他们每逢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不是毛主席说的吗？’直弄得全连上下哭笑不得”。〔9〕

当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荒也也有这样的文革记忆——

“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口号鼓动下，我们这些既无能力上街造反，又无学可上的孩子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地跑到公共汽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那时，就凭着胸前的像章、手中的语录便可以无票上车，就可以占领车厢，让那些司机、售票员和大人们规规矩矩，俯首帖耳。……汽车起站，我们便挥动语录，命令所有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立正站好，取出自己的语录本，然后向车前悬挂的毛主席像做早请示。模式是，把语录放在胸前，注目毛主席像，然后我们领呼口号，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众人齐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封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众人齐和：‘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请示完毕，乘客们才可落座。我们便正式开始了宣传。……我们读到《毛主席语录》那一段，就命令乘客把书翻到那一页。偶尔发现谁没带语录，我们就围了上去，质问其出身是什么，为什么不带语录，还要警告他不准再犯，因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忠。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文

化革命的初期。那时，语录成为我们唯一的书，车厢便是我们的课堂，不管车上有多少乘客，天气有多冷多热，也不管嗓子多渴，只要一上车就声嘶力竭地喊呀读呀，有时候末班车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我们仍然要读下去，因为这是革命态度问题”。〔10〕

今天来看这一切，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忠字化”的荒谬与幼稚，但在历史的当时，却是极其严肃、认真的，而且是全民性的，无论是吴非这样的士兵，还是荒也这样的孩子，更有许多的知识分子，都不无虔诚地参与其间。重要的，还不是这里谈到的外在的形式（跳忠字舞，念语录等等），而在那渗入头脑、心灵的信仰：把毛泽东置于拯救众生的“上帝”的地位，对之顶礼膜拜。这是一个全民的造神运动，要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教，即毛泽东教。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将中国传统就有的世俗帝王的政治权力（在现实中就是党的绝对权力）和宗教教主的精神控制力结合为一体。后者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却正是毛泽东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宣称他对“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不感兴趣，而最认同“伟大导师”就是这个道理：前者只掌握政治、军事权力，而后者却拥有精神掌控权。这就是说，文革的新宗教运动首先是出于毛泽东的战略目标，而得到全民的响应，则是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需要：缺乏宗教式的信仰始终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文革的造神就正好起到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作为新时代的信仰的作用。《毛主席语录》对许多人产生那样大的精神震慑力，就是这个道理：《语录》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圣经”。既然新的造神运动是适应毛泽东取得对全民的精神控制力的需要，吴非、荒也回忆中的那些形式：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还是以毛主席语录作为每个人表达自己和彼此交流的主要手段，都是不仅要用毛泽东思想，还要用毛泽东思维、语言来改造、渗透、支配每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情感与语言：这才是真正的“收心与摄魂”。而吴非、荒也的回忆，还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神如此有效与有力，除了它也是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之外，更是因为其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威力：凡有不服从者，都要遭到“你是什么出身”之类的质问，那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而荒也这样的小孩子，居然能够让成年人“俯首帖耳”，也是因为他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有毛泽东的权力支持。这样，权力支撑下的文革新宗教运动，就造成了全民的宗教式的狂热与精神迷乱。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造神，不仅是一种信仰的需要，也同样有利益的驱动。当年的高中生、今天的大学教授尤西林在他的回忆里，就谈到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看似全民一致，但其实是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诉求的。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毛主席”有着“不同含义”。他分析说，“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既得利益者”则把毛泽东视为“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一个“人格化的象征”。〔11〕这正是提示我们，在文革中的领袖崇拜，在接受毛泽东的控制的同时，也还有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的一面。既虔诚地造神，也利用神把它当招牌：前者把毛泽东思想推向空前神圣的地位，后者又将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化，形成了实质上的危机：这都构成了文革造神运动的复杂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种丰富性，是不可不注意的。

正因为文革新宗教运动，有着这样复杂的因素的相互制约，它也就很难持续。前文回忆中的宗教式的狂热，大都发生在文革初期。到文革中后期，随着文革的问题，特别是它的专制本质逐渐暴露，首先导致的普遍的政治热情的消退，许多人都从响应毛主席起来造反，变成了“逍遥派”，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前述造神运动中的许多形式主义的做法，准宗教仪式都渐渐失去吸引力，进而引起反感，而难以坚持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文革，也就必然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尽管真正走出毛泽东，还要经历更多的曲折，许多人都是1971年林彪出逃才开始引发对毛泽东的反思的，但最初的狂热劲儿还是过去了。更重要的，是同



时发生的理想的破灭，信仰的动摇。许多人都转向虚无主义。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与虚无主义，最终消解了文革的新宗教运动，这都是发人深省的。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